



叶圣陶的教师生活叙事

文 | 周勇

引言：沉默的教师及其“主体”迷思

十分“专业”的舒尔曼也好，学科(专业)边界模糊、极具批判精神的吉鲁、麦克拉伦也好，抑或是联邦政府威力强大的“课程标准”也好，其实都是在建构一种理想的教师“主体”，然后对教师实施规训，意图把教师塑造成理想的“主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往往是沉默的；与之相联系，教师实际是什么样的“主体”，其实无人知晓。

近两年，舒尔曼(Lee S. Shulman)的PCK理论(即“学科教学知识”)突然在国内教育理论界变得十分流行，许多写教师的硕士、博士论文都在引用它，似乎不依靠它，便没法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依靠PCK来写教师？关于教师，可写的东西有很多，为何单单只写PCK呢？因为有这些困惑，所以会对舒尔曼的PCK理论做点考察与反思。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发现，舒尔曼作为新一代“教师研究者”十分想改变当时结构分裂的教师培养体系——学科专家负责向教师传授“学科知识”，教育专家传授“教学法”，两者毫无关联。他认为，必须开发一种能将两者整合起来的新“知识”，否则即使学了再多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法”，教师也不知道如何把“学科知识”教给学生。

正是这一变革意志催生出了“学科教学知识”，专业的教师研究与书写也由此将重心转向探讨教师如何把“学科知识”教给学生。不久，又觉得教师还必须研究学生如何学习，因此把“学习科学”列为PCK的基础知识。就这样，PCK演变成结构日益复杂庞大的“教师专业发展”话语体系。当然，这一结构演变并未改变舒尔曼的教师书写方式与精神，而是使之更“专业化”：相比于舒尔曼意在表达“教师最需要的是学科教学知识”，后继者不仅坚信自己准确把握了“教师最需要什么”，而且能以更“专业化”的话语生产方式，向教师提供“基于学习科学的学科教学知识”一类的更为精细的“教师专业”知识。

遗憾的是，九十年代以来，舒尔曼一系的教师研究及其“教师专业发展”话语遭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改革领域的



写作中的叶圣陶

强势崛起，无法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影响力。关于“教师最需要什么”，美国联邦政府也有一套话语，认为全体美国教师最需要的是“一套“基于标准”的教学研究、教学评价和教学改进能力。不仅如此，美国联邦政府还有强有力的政策工具、经济驱动和质量监控机制，能向全美教师推行其“基于标准”的“教师专业发展”话语，使全美教师成为“世界一流学业成绩的创造者”。这套话语的影响力显然大过舒尔曼一系，甚至许多“教师研究者”都纷纷转向为联邦政府生产“基于标准”的教学评价和教学改进工具。

舒尔曼一系的竞争对手还不止联邦政府，吉鲁、麦克拉伦等大学里的同行也能对舒尔曼一系构成竞争之势。在这群自命为“批判教育家”的“教师研究者”看来，教师最需要的既非“学科教学知识”，更非联邦政府的“课程标准”，而是杜威进步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关怀和教育改革理想，所以他们贡献的一系列教师书写方式，如教育社会学、教育意识形态分析、教育文化批判等，都是为了引导教师成为抵制联邦政府“质量标准”课程改革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超专业“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教师专业话语也在回答“教师最需要什么”(如国内非常熟悉的诺丁斯提出的“学会关心”)，不过，上述一番考察已足以表明：关于教师，PCK理论到底能说什么。很明显，PCK理论只是不断在说，“教师最需要的是学科教学知识”，



如果能让教师掌握它,教师便可以成为“教学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做上述考察时,恰好听到刘良华教授的PCK反思。他也认为,PCK并未说出什么道道来,许多更重要的东西都不在其中,尤其一线教师的辛苦,更是自一开始就被其回避了。

当然,上述考察与反思绝非仅仅指向PCK,毋宁说是为了通过PCK,引出专业的教师研究与书写一直以来都未正视的内在困境:十分“专业”的舒尔曼也好,学科(专业)边界模糊、极具批判精神的吉鲁、麦克拉伦也好,抑或是联邦政府威力强大的“课程标准”也好,其实都是在建构一种理想的教师“主体”,然后对教师实施规训,意图把教师塑造成理想的“主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往往是沉默的;与之相联系,教师实际是什么样的“主体”,其实并无人知晓。此即本文所谓“沉默的教师及其‘主体’迷思”。

关注教师,但其心意却极为不同,如果说前者的关注是为了把教师塑造成理想的“主体”,那么叶圣陶的关注则是为了解理解教师的现实处境及其艰难的主体建构状况,唤起人们对于教师工作的真切同情与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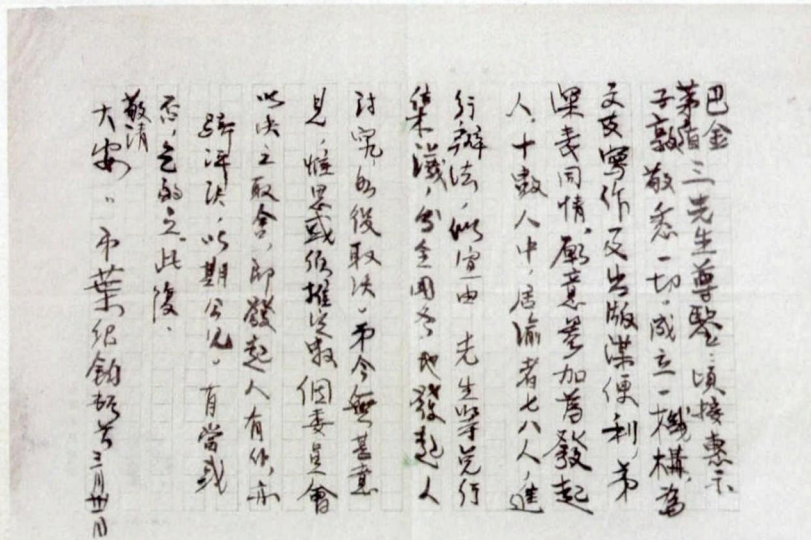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克服上述未被正视的教师专业研究与书写困境,将长期沉默的教师实际可能是什么样的“主体”呈现出来呢?对一线教师的生活世界展开“人类学”研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本文所要提出的却是叶圣陶的方式,即教师生活叙事。

和此前提到的各类专业的教师研究者相比,叶圣陶也非常关注教师,但其心意却极为不同,如果说前者的关注是为了把教师塑造成理想的“主体”,那么叶圣陶的关注则是为了解理解教师的现实处境及其艰难的主体建构状况,唤起人们对于教师工作的真切同情与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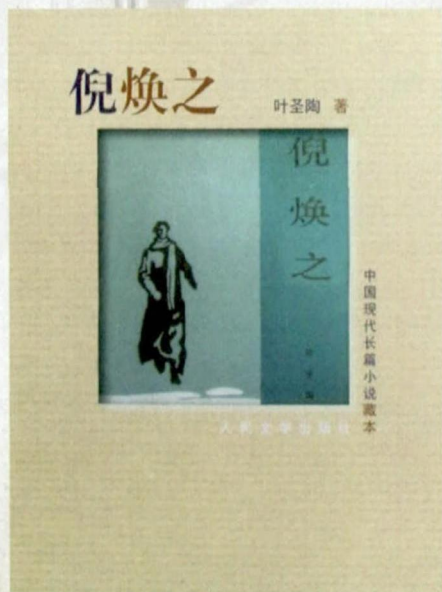
为什么叶圣陶要从事这种教师研究与书写呢?众所周知,叶圣陶1911年高中毕业后便在家乡做起了小学教师。1913年,比他低一级的同校好友顾颉刚考取北大,叶圣陶仍在小学教书。事实上,直到1921年和郑振铎、沈雁冰等人组建“文学研究会”,叶圣陶一直都在基层做教师。正是这一经历,让他形成了持续一生的教师与教育情结。但他终究还是离开了学校,不再做一线教师。他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人生选择,是因为和当时其他许多“新青年”一样,他也认为,在当时的学校里做教师难有大发展,更不可能成就一番有意义(有利于国家与社会进步、个人也满意)的教育大业,尽管他其实很热爱教育。

失败的教育改革者与普通的无名者:叶圣陶的教师生活叙事

和此前提到的各类专业的教师研究者相比,叶圣陶也非常



叶圣陶的手稿



长篇教师生活叙事《倪焕之》



离开学校后,叶圣陶通过积极参与当时“新文学”体系的创建工作,获得了一线教师无法获得的发展平台与教育成就,从而有条件成为教师的指导者或塑造者。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很轻松地借助商务印书馆及其“新文学”共同体在教育界的广泛影响力,指导当时的教师如何从事“新教育”改革,然后把自己发展成极具号召力的“教育专家”——就像舒新城那样,指导数百所学校实施“道尔顿制”,使广大教师成为“新教育的创造者”。

然而何以叶圣陶在文化教育界赢得些许高位之后,没向一线教师提出改革要求,或将教师塑造成某一理想的教育“主体”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太了解一线教师的实际处境,深知从教师实际处境来看,教师很难甚至无法成为任何理想的教育“主体”。他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教师生活叙事,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打破当时各路“教育家”塑造的理想的教育“主体”,呼吁在了解实情之前,别让教师承担太多其实无力承担的重任。

首先值得提起的是1928年推出的长篇教师生活叙事《倪焕之》。这位名叫“倪焕之”的教师因为深受“五四新文化”与“新思想”的熏陶,下决心要成为杜威式的“新教育”缔造者。但之后,个人无力左右的复杂教学改革进程,机械乏味的家庭日常生活,以及日益逼仄的社会大环境却在一点一点蚕食倪焕之的教育激情与理想。最终倪焕之只得彻底放弃“新教育”改革,转而投身“革命”了,然后很快便被当局逮捕、处决。这就是叶圣陶所试图让大家重视的现实教师“主体”形象:在当时任何个人都无力驾驭的教育与社会体系中,教师只能成为“失败的教育改革者”。

其次是1928年之前创作的一系列短篇教师生活叙事。《倪焕之》中的教师还有名字,其所做的事虽然失败了,但终归还能算得上“虽败犹荣”,因为毕竟曾无比投入地为发展“新教育”奋斗过一番。而那些短篇教师生活叙事,《潘先生在难中》《饭》《乐园》以及《校长》等,真叫惨淡,其中的教师竟连姓名都是模糊的,所做的一切更谈不上是在追求“新教育”,仅仅只为保住一“饭碗”便被弄得可怜兮兮,或斯文扫地。总之,这里的教师大都是“普通的无名者”,无法把自己塑造成任何像样的“主体”。

叶圣陶与当代教师书写及“主体”认同

当他们在各种高位构思“教师专业发展”,引领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或“专家型教师”时,是否会想起自己昔日的教师经历,并将它融入自己的“教师专业发展”思考与引领行动中呢?

由于了解太多的教师生活真相,再加上痛恨当时教育界内外环境无法让教师展开像样的教育工作,叶圣陶的教师生活叙事难免有些夸张之处,对于教师实际能成为什么样的“主体”也显得有些悲观——仿佛现实中的个体教师除了成为“失败的教育改革者”和“普通的无名者”之外,什么“主体”也发展不出来。但在当时,到处都是对教师发号施令的人,像叶圣陶这样体谅教师的人确实不多,尤其跻身文教界高位后,仍能体谅教师,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他之所以热衷于创作教师生活叙事,一定意义上正是为了打破当时各路“教育家”塑造的理想的教育“主体”,呼吁在了解实情之前,别让教师承担太多其实无力承担的重任。

由此想到当代西方教育理论界,其中有不少人在转身成为“教授”“专家”之前,都做过一线教师。比如,吉鲁成为“著名批判教育家”之前,便是一名中学英文教师。为什么他跻身更高位置后,会致力于让不堪重负的教师去承担理想的教师“主体”角色呢?难道他忘了自己曾经的教师经历?资料显示,像吉鲁这样的“教授”或“教师研究者”并未忘记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他的教师书写致力于让教师成为“批判的知识分子”,是为了激励教师与他携起手来,重塑被“不懂教育的右翼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当代西方教育体系(尽管无论吉鲁如何书写,都已不大可能回到杜威时代,据说那时教师是教育的主人)。

吉鲁的教师研究与书写很震撼人,但恐怕也不能因此不去理解、叙述教师实际可能是什么样的“主体”吧!由此又想到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界,其中也有不少“教授”“专家”做过一线教师。当他们在各种高位构思“教师专业发展”,引领教师成为“课程领导者”或“专家型教师”时,是否会想起自己昔日的教师经历,并将它融入自己的“教师专业发展”思考与引领行动中呢?可惜这里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所看到的种种“教师专业发展”运动还在变化之中,未到可以对其结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的时候。

不过,从叶圣陶的经验来看,倒是很希望当代中国的教师书写能不断涌现充满现实感的教师生活叙事,因为只有充分尊重现实,才可能慢慢搞清楚:当“课程领导者”“专家型教师”或“批判的知识分子”等国内外“教师专业发展”理想一个个都被大家了解之后,当代中国教师实际是什么样的“主体”,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的“主体”?还好,当代中国的教师书写与教师实际的“主体”建构仍都处于“转型”或“摸索”之中,或许不久的将来便可形成被教师广为认同、并且切实可行的“主体”理想,说不定还能回溯、进而却叶圣陶等教育界前辈意犹未尽的对“现代中国教师”的关怀与诉求。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